

## 查読論文

# 近代滿洲地區米穀與麥粉貿易及其商業組織變遷 (1864—約1930年)

陳計堯\*

## 摘要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滿洲（即所謂「東三省」），經歷在社會經濟上巨大的變化。從1860年代開港以降展開的經濟開發，除了帶動過去早已興盛的大豆輸出再推上新的發展頂峰之外，近代滿洲也出現其他的變化。大量人口從鄰近的河北、山東移入滿洲，另有外國移民（尤其是俄羅斯人、朝鮮人以及日本人）亦為數甚鉅，形成一個多元、多重移／殖民下的社會。這些社會經濟的變遷對於過往重視大豆貿易的滿洲經濟，提供新的發展機會，也實際上產生對大豆以外的糧食作物的需求，也可能對糧食貿易的組織有相當的影響。本文利用麥粉與米穀這兩種糧食進行比較研究，針對近代（1864—約1930年）滿洲開發下新糧食的貿易變遷，探討其與相關商品之商業組織變遷的關聯。

透過探討近代滿洲糧食市場中的米穀與麥粉兩種物品的貿易變遷，本文論述滿洲在貿易量方面雖然有明顯成長，但到1920年代初期開始走向停滯，且長期以來以進口為主，就連滿洲本來擁有優勢的小麥貿易也在1920年代走下坡。進口的麥粉與米穀，對滿洲當地的麥粉與米穀貿易組織卻存在不同的互動狀況。我們亦發現滿洲的米穀與麥粉商業組織出現兩種不同的發展型態，一是麥粉貿易中製粉業在原料採購到產品銷售，均依靠市場機制，透過市場仲介進行交易，使得在體制上容易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更不容易面對在同時期從上海進口的麥粉之競爭，因為長江下游地區出現製粉企業的「垂直整合」。二是在滿洲米穀貿易中（包含滿洲米、朝鮮米）之碾米、精米工廠與相關米商，「聯號」模式並不明顯，日商貿易商社也經營多元商品，並不專營米穀貿易，卻因為滿洲地區移民飲食習慣的關係，出現具有部份達成「垂直整合」的精米業，呈現與長江下游、廣東等地區有明顯的差別。

## 關鍵詞

滿洲、米穀、麥粉、製粉工廠、精米所

## 一、引言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滿洲（即所謂「東三省」），經歷在社會經濟上巨大的變化。從1860年代開港以降展開的經濟開發，除了帶動過去早已興盛的大豆輸出

---

\* 執筆 者：陳計堯

所屬 / 職位：臺灣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連絡 先：臺灣臺南市（701）東區大學路一號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

E - m a i l : kaiychan@mail.ncku.edu.tw

再推上新的發展頂峰之外，近代滿洲也出現其他的變化。晚清的開港讓滿洲地區經歷與過去數世紀迥異的社會發展，滿人對滿洲的封閉政策一變成為開放「移民實邊」，使得大量人口從鄰近的河北、山東移入滿洲，另有外國移民（尤其是俄羅斯人、朝鮮人以及日本人）亦為數甚鉅，形成一個多元、多重移／殖民下的社會。<sup>1</sup> 這些社會經濟的變遷對於過往重視大豆貿易的滿洲經濟，提供新的發展機會，也實際上產生對大豆以外的糧食作物的需求。

1860年代以來的開港也使得滿洲地區在經濟上正式擴大與國際之間的聯繫，不單讓本地的物產（大豆以及其他商品）可以更直接地送往海外市場（例如大豆市場遠至歐洲），更使海外資本與技術有投資的機會。<sup>2</sup> 在20世紀初期因為外資的進入與華資的跟進而展開工業化，糧食貿易也產生結構性變化。尤其是對各種新移民來說均甚為重要的製粉工業，20世紀初出現大量以蒸氣動力為主的製粉工廠，以及利用部份蒸氣動力與傳統動力（人、獸等）的「磨坊」，使得滿洲地區的麥粉貿易網絡與規模，面向擴充與延伸。<sup>3</sup> 另一方面，20世紀初米穀開始大量從外地、外洋進口至中國各通商口岸，滿洲地區的口岸也不例外。這些發展對於當地不只是飲食習慣甚至糧食貿易的組織，均可能有相當的影響。<sup>4</sup> 到底在近代滿洲地區境內外的新糧食貿易呈現何種的流通現象？在這些貿易變遷與工業化的影響下，個別的糧食貿易機構（如糧棧、磨坊、製粉工廠<sup>5</sup>等）的運作又如何改變？這些不同的市場參與者的經營結構又與糧食市場發展結構之間有何聯繫？

其實，關於糧食貿易拓展與貿易組織變遷之關係，亦為近人所關注。陳計堯曾經透過探討近代長江下游地區的糧食市場中的米穀與麥粉兩種物品的變遷，論述不單只是在量方面的明顯成長，而且在結構上也產生不同的發展。一是米穀貿易中，市場參與者多出現「分散繁衍」(market proliferation)的發展而缺乏企業內部的垂直整合 (vertical integration)。二是麥粉貿易中出現的大企業採用垂直整合的制度。雖然，碾米工廠與米商均能利用他們在本地或外地的「聯號」來採購米穀，並且把這些商業網絡更往其他的來源地繁衍，但是這些商號或公司之間，並沒有建立出一套垂直整合的制度。相反地，在製粉工業發展出具有垂直整合性質的制度，擴大經營包括原料採購與製成品販售業務，而不需要單靠通過像批發商一類的市場組織來進行採購與銷售業務。<sup>6</sup> 另一方面，近代長

江下游地區糧食貿易金融中，米業中的米行與糧行、製粉業中的製粉工廠分別在其業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他們在糧食貿易金融與加工過程中往往提供相當的融資方法以利商品之流通。明顯地，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糧食貿易的融資結構中，商人與製造商實在地扮演重要的角色。<sup>7</sup>

對於上海與長江下游以外的地區，米穀與麥粉兩種物品的變遷情況又如何？目前所知的研究只有普遍被認為以米食為主的廣東，它在貿易量方面雖然有明顯成長，但長期以來均以進口為主，進口的米穀與小麥，並非催生糧食加工業的基礎，反而是從本國與外洋進口者在廣東競爭的實證。<sup>8</sup> 這些變化當中，香港不但作為廣東米穀貿易的轉運站，也成為華南地區麥粉貿易的中繼港，所包括的品種涵蓋外洋與土產，其地位實至為重要。在米穀與麥粉兩業的商業組織中，又呈現兩種不同的型態。一是米穀貿易中碾米工廠與米商，均能利用他們在本地或外地的「聯號」來採購米穀，並且把這些商業網絡更往其他的來源地繁衍。二是麥粉貿易中因為長江下游地區出現企業的「垂直整合」，擴大經營包括原料採購與製成品販售業務，使得在上海以外的廣州麥粉市場也受到相當的影響。在這些經營與經濟的因素影響下，廣東在20世紀漸漸地放棄發展製粉業，也使碾米業發展漸形困局。

對於普遍被認為以麵食為主的滿洲，也就有它在糧食貿易發展與組織變遷這一研究主題中的重要性。滿洲地區糧食貿易，一直是過去中國經濟史上的重要課題之一。其中，自從晚清開港以來，滿洲地區的大豆便因歐洲市場需求的關係，引起外商與中國海關外籍官員的注意，<sup>9</sup> 到20世紀初期日本學者對當地大豆產業更有豐碩的研究成果。<sup>10</sup> 戰後到晚近中國學者在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或「國內市場」問題時，也因為明清時期滿洲地區的開發而導致的大豆貿易，常為學者所注意，多琢磨於大豆貿易與中國關內農業地區（尤其是江南地區）農業發展之密切關係。<sup>11</sup> 透過這些研究，我們對於滿洲地區以大豆為主的糧食貿易自從明清以來到1937年為止的變化，有不少的認識，特別是滿洲大豆不單為清帝國糧食問題提供其中一個出路，其副產品（豆餅）也成為其他地區農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大豆產業成為該地區一枝獨秀的重要貿易商品之現象，甚至在1930年代所謂的「滿洲國」時期，仍然引起學者與官方的關注。<sup>12</sup> 此外，19世紀後半滿洲地區的大豆加工業的技術轉移，早在1980年代也已被學

者用以印證晚清民初中國社會對於技術轉移與創新的侷限，以及技術轉移所需要的社會環境。<sup>13</sup> 這些成果顯示，過去對於大豆與豆品的研究其實相當豐富，反而對於其他糧食的貿易與工業化問題卻不甚深入。到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滿洲地區大豆以外的糧食貿易產生何種的變化？這些的變化對我們理解近代中國的貿易發展與企業變遷又有何關聯？這些問題就成為我們對滿洲地區進行個案研究的出發點。

針對近代滿洲開發下新糧食的貿易變遷，探討其與相關商品之商業組織變遷的關聯，本文利用麥粉與米穀這兩種糧食進行比較研究。一方面，近代滿洲的小麥種植，因應社會經濟的變遷而佔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有所謂「南豆北麥」的局面<sup>14</sup>，可見小麥及麥粉對於近代滿洲的重要性。至於米穀，雖然在數量上無法與麥粉、小麥等比擬，但卻是與滿洲移民、土地開發中重要活動一環的水田開墾活動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面，沿用「米穀、麥粉」之比較研究架構，有利於我們日後能將滿洲的分析成果與過去研究的其他地區進行更具意義的分析與關聯。至於滿洲其他的重要糧食，如高粱、小米，雖然在近代滿洲的社會經濟地位也相當之重，但因為篇幅所限，只能留待日後的研究。

本文對於研究的斷代界定在1864年至大約1930年為止，主要是與滿洲地區歷史變遷有關。雖然滿洲在此之前便有複雜的移民史，但要到「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條約簽訂後，清廷「移民實邊」政策開始時，才成為一個新的歷史里程碑，1864年開始更有清帝國海關在當地的第一個貿易統計。本文以1864年為起點，即希望能討論滿洲地區展開近代貿易關係，而清帝國海關的統計資料也就顯得重要。至於本文研究下限訂約在1930年，則希望把討論的中心設定在1931年「滿洲事變」這一重大政治事件以前的狀況，以避免把部份「滿洲國」建立後所造成的歷史變遷，與在此之前的狀況混為一談，但若有部份資料因涉及1931年者，為分析需要我們還是會加以研究與討論。

## 二、米穀、麥粉貿易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必須理解近代滿洲糧食貿易的基礎。滿洲雖然氣候比較適合種植小麥，也並非不能生產稻米，20世紀中期的農業地理調查顯示，滿

洲有些許稻米的種植。<sup>15</sup> 但無論是小麥抑或是稻米，均非自明清時代的滿洲即有，而可能是近代所開發的。明代滿洲的住民主要是包括日後所謂「滿洲人」的前身「女真人」，以及蒙古人，多為狩獵、捕撈、採集等活動。從女真人日常生活中「以玉米、稗子、高粱米、小米、蕎麥為主食」可見，明代滿洲的稻米與小麥的栽種並不普遍。<sup>16</sup> 到清代，滿洲因為政府的封禁政策，也使得該地區在經濟活動上部份維持明代的格局。不過，經歷晚明清初的動亂與戰爭，滿洲地區除了滿洲人與蒙古人之外，也有朝鮮人、投靠滿清的華人，以及數個少數民族所居住，其中除了朝鮮人有栽種稻米的技術之外，大概就只有在滿清「皇莊」（以及「官莊」、「糧莊」）或旗人「旗地」工作的華人才有。<sup>17</sup> 問題是清初到中葉滿洲實質上有多少的稻米、小麥栽種，具體狀況可能並不是清楚的。清政府對滿洲地區「奉天」一省所進行的糧價報單調查中，除了「稻米」、「小麥」之外，尚有「粟穀」、「粟米」、「高粱」、「黃豆」與「黑豆」等，意味著地方官員收集糧價時各地糧商所涉及的穀物並非以小麥與稻米為中心。<sup>18</sup> 但清代檔案中出現有關內務府「糧莊」或相關的資料中，雖有「稻米莊」一類，作為提供盛京糧食所需，卻只是多種「官莊」的其中一種。<sup>19</sup> 檔案中亦常出現「糧」這一個詞彙做為賦稅時的徵收對象，但不一定指稻米、小麥，而可能包含玉米（「包米」）、小米、大豆等穀物。<sup>20</sup> 而且乾隆年間滿洲各地甚至「銀米兼徵」，<sup>21</sup> 顯示所需要用作賦稅的「糧米」又可減半。無論如何，到清中葉為止的滿洲應該有少數的稻米與小麥之栽種與消費。至於能否達到大量又普遍的程度，就並不是十分肯定。

開港通商對於米穀、麥粉與小麥貿易的影響，也並不是及時的。根據中國海關《年統計》所整理的資料所示（見表一），在開港初期滿洲地區只有牛莊 / 營口一港對外開放國際貿易。從當地開始刊載通商統計數據的1864年算起，牛莊 / 營口一地在往後的三十年之中，米穀與小麥雖有少量貿易但並不能持久，麥粉貿易更近乎不存在。到1870年代中期以後，米穀進口（從外國與本國）逐漸成為常態，雖然並非只有成長，但總算是連貫而持續的。這些在開港頭三十年的米穀與小麥，多是進口型態，顯示對於這兩種糧食的需求可能在常規化發展中，但當地主要的糧食仍然是傳統的小米與高粱。

表一、1864-1894年牛莊 / 營口港小麥、麥粉、米穀貿易之情況 (通過海關的部份)

年份	小麥			麥粉			米穀		
	外國進口	本國進口	出口 (對本外國)	外國進口	本國進口	出口 (對本外國)	外國進口	本國進口	出口 (對本外國)
1864			7212						5790
1865			18435.6						37728
1866			1920						
1867									
1868									
1869									
1870									
1871								990	
1872									
1873							1190	719	
1874									
1875									
1876							1986	1986	
1877							15725.82	15725.82	
1878							50477.08	50477.08	
1879		48000			10000		22199.56	22199.56	
1880							277.27	277.27	
1881							665.4	665.4	
1882							3103.58	3103.58	
1883							5247.6	5247.6	
1884							9580.5	9580.5	
1885							2363.17	2363.17	
1886							43889.84	43889.84	
1887							5085.04	5085.04	
1888							15105.96	15105.96	
1889		64391.44					258432.4	258432.4	
1890		1820					29464.51	29464.51	
1891		8252.44					35235.7	35235.7	
1892		930					26421.46	26421.46	
1893		22897.51					44605.06	44605.06	4445
1894		32646.05		438			14707.01	14707.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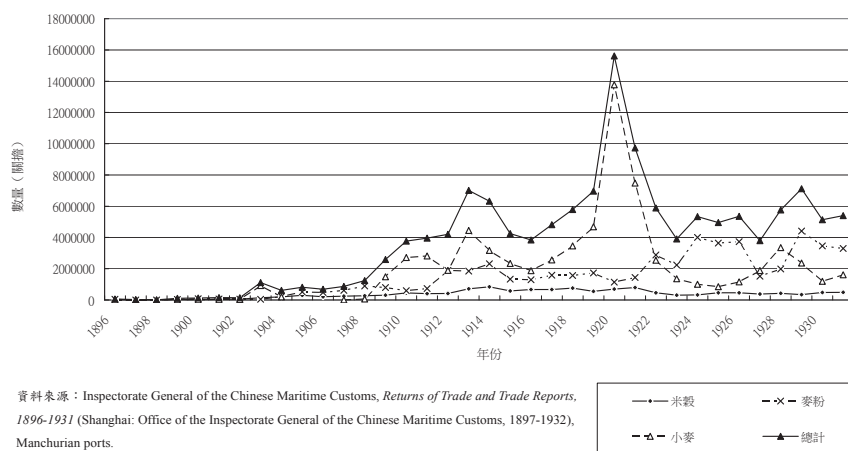
單位 = 海關擔 (picul), 簡稱「關擔」

備註：以上數字不含轉口數，亦即只有淨貿易數；1894年的麥粉數字並不存在數量，只有金額海關兩1,273兩，並從其他中國條約港進口的洋粉。現以最近有可考的1896年相同的洋粉進口總量與總金額平均數每一關擔約值2.906367海關兩推算，1894年的數量約為438關擔。

資料來源：Inspectorate 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64-1896* (Shanghai: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5-1897), "Newchwang".

到20世紀初，滿洲的糧食貿易持續成長。改變的主力應該是在1900年以後，隨著滿洲的政治、經濟情勢轉變而發展，也因為港口數量逐步增加而造成。滿洲的通商口岸從原來的牛莊 / 營口的「獨口」狀況，轉變成為1912年的11關（愛琿、安東、大連、哈爾濱、琿春、龍井村、滿洲里、牛莊、三姓、綏芬河、大

東溝），雖然日後有些口岸合併，把滿洲的通商口岸數目減至1931年的7關（愛琿、安東、大連、哈爾濱、琿春、龍井村、牛莊），但基本上維持在清末民初的通商口岸規模，使得20世紀頭30年的滿洲糧食貿易規模與19世紀末的30年有明顯的差異。我們根據中國的海關《年統計》所整理出圖一，粗略地表示從1896年開始至「滿洲國」成立以前的1931年，米穀、麥粉與小麥三方面的貿易總量（包括進口、出口等），大體上有持續與穩健的成長。雖然在1918年之後有數年衝破1千萬關擔的情況，其後消退，但仍然維持在400萬關擔以上的水平。這與1908年以前的200萬關擔以下的水平，實在是有明顯的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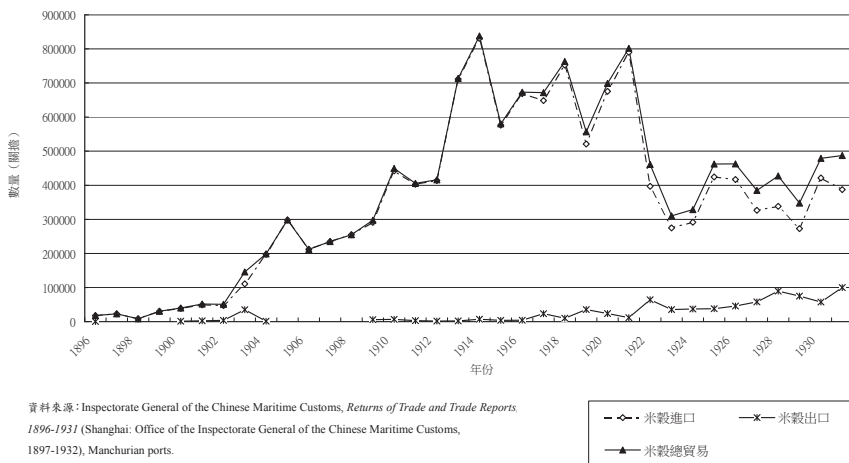
圖一、滿洲地區米穀、麥粉與小麥貿易，1896-1931

在本文討論的三種糧食之間，也有明顯的差異。米穀方面，貿易總量在1896年以後逐漸成長，到1910年代中後期維持在50多萬關擔至80多萬關擔的水平。但米穀貿易總量從1922年開始即停滯不前，維持在50萬關擔以下的水平。當然，滿洲地區因為地理、氣候等關係，米穀貿易本來就在清代時不甚發達，但到了20世紀的頭30年卻仍只有50萬關擔以下的水平而無法再往上攀升。其中原因，如同下文將會討論的，也與滿洲地區米穀生產、消費，以及和麥粉消費之間，均脫離不了關係。

至於麥粉貿易，根據前述表一，麥粉貿易總量在1895年以前不甚有幾，但自1896年4萬多關擔開始逐漸發展，並如圖一所示的快速成長至1912年的180多萬

關擔的水平，更在接下來的1910年代、1920年代不斷增加，最高達到1929年的440多萬關擔。在1910年代、1920年代，麥粉貿易總量亦多維持在200多萬關擔與300多萬關擔的水平，也使得整個滿洲地區也在中國麥粉貿易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滿洲地區因地理、氣候等關係，適合種植小麥，並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小麥貿易的重要地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滿洲地區小麥貿易總量從1909年開始衝破一百萬關擔的貿易總量，並曾經在1920年一度達到1370多萬關擔之多，但此後又連續急跌，從1922年開始跌至250多萬關擔至最低的1925年的85萬關擔的水平。雖然，此後的六年時間有回升的現象，但最高也只能到1928年的330多萬關擔，其他年份大多在200萬關擔以下。如果在單就麥粉與小麥之間的關係探究，不難發現滿洲地區麥粉與小麥貿易之間存在一種替代關係，每當小麥貿易提升時，麥粉貿易便下降。這種貿易結構，也明顯地反映著當地製粉業的發展問題。

如果仔細地分析滿洲糧食貿易的成長與變化，我們會發現米穀、麥粉與小麥貿易的差異，相當明顯。米穀貿易方面，正如圖二所示，米穀貿易在所討論的年代裡絕大部份為進口，並從1900年以後20年便維持成長趨勢，顯示滿洲地區米穀消費人口大幅成長。但在1921年以後，米穀進口貿易大幅下降，連帶也使得整體米穀貿易總量下降。與此同時，滿洲地區的米穀出口有逐步攀升的趨勢，雖然數量均不超過10萬關擔，但仍對下跌中的米穀總貿易額有補充作用，並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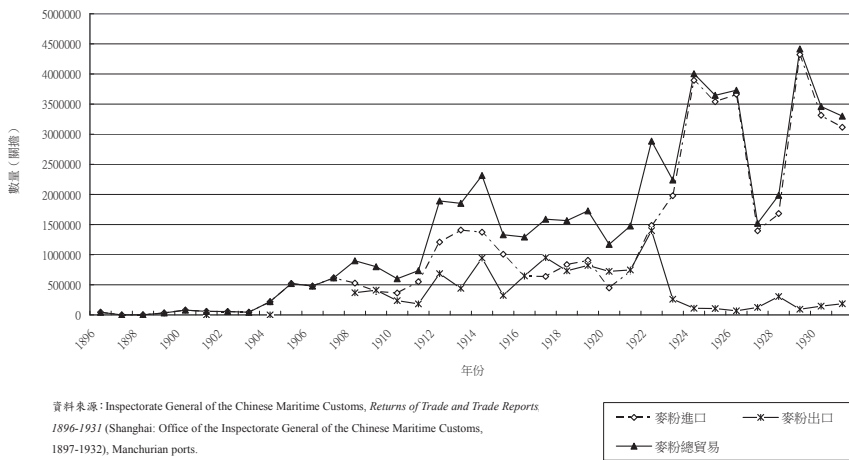


圖二、滿洲地區米穀進出口情況，1896-1931



整體米穀貿易總量與進口的在1921年以後的停滯不前，成為強烈的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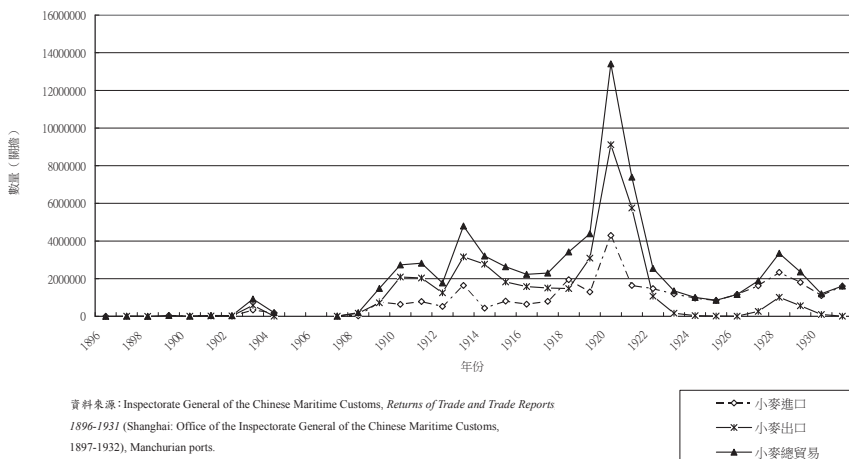
相對地，麥粉貿易在1896年以後基本上在成長的方向，就如圖三所示，到1920年代也基本上呈現成長趨勢。不過，以麥粉的貿易內涵來觀察，麥粉長期以來均以進口為重，到1908年以後麥粉開始出現出口，並與進口麥粉數量相當。到1920年代初期，麥粉出口漸漸地失去動力，反而使已經發展為製粉業重鎮的滿洲地區，出現麥粉進口為麥粉貿易的大部份，麥粉進口與出口之間的差距，也從此拉大。所以，滿洲地區麥粉貿易的關鍵在1920年代初期。



圖三、滿洲地區麥粉進出口情況，1896-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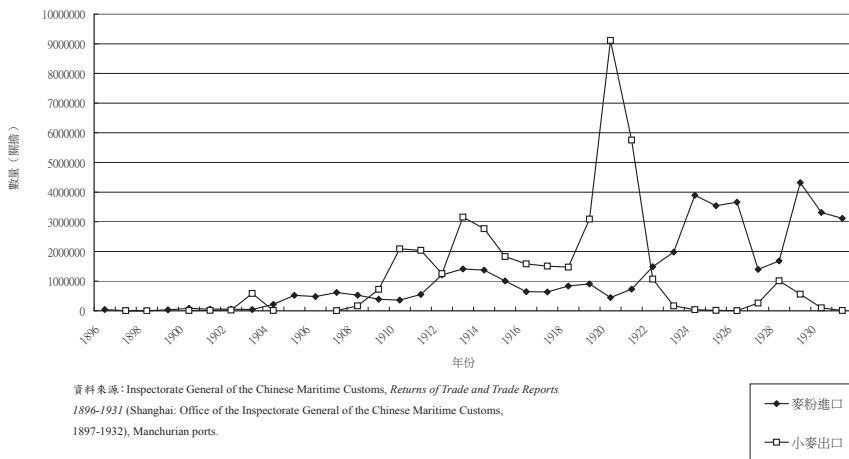
相反的是，滿洲地區小麥貿易在1920年代初期以前，正如圖四所示，是以至國外或中國其他通商口岸出口為主，小麥出口甚至曾經是三種糧食貿易中的最大者。但到了1920年代初期以後，這種情況逐漸轉變成為以從國外或中國其他通商口岸進口為主，小麥出口甚至下跌至低水平，使曾經作為製粉業重鎮的滿洲地區，也成為需要從外地或外國進口小麥的地區。

如果再把麥粉進出口貿易與小麥進出口貿易進行交叉比對，滿洲地區麥粉市場的結構性轉變就更加明顯。圖五與圖六就是要展現這一種轉變而設計的。如圖五所示，滿洲地區從1900年代開始逐漸進口麥粉，但小麥出口也逐漸成長。到了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期小麥出口達到高峰，而麥粉進口仍然徘徊在100萬關擔的水平。到了1920年代初期，麥粉的進口卻是不斷加強中，在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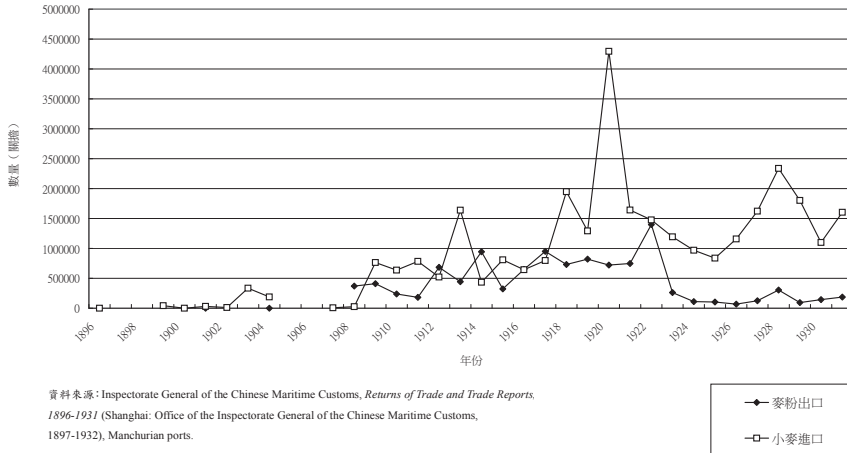
圖四、滿洲地區小麥進出口情況，1896-1931

年代末期、1930年代初期，基本上已經超過300萬關擔的水平，這與正在滑落的小麥出口來說，成為強烈對比。另一方面，滿洲地區對麥粉消費之成長，也可以從圖六中觀察到。圖六所示，作為原料的小麥進口到1920年代初期雖然仍在進行，但麥粉的出口卻也在大概的同時大幅減少。同時，原本在20世紀初期，麥粉輸出甚微。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應歐戰的需要，小麥與麥粉均雙雙出口。到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期，滿洲地區麥粉出口急速下降。這可能顯示，滿洲地區的小麥已經不再以出口為主，反而成為供應本地所需要的食品原料。



圖五、滿洲地區麥粉進口與小麥出口關係，1896-1931

但滿洲本地對於麥粉的需求，也同樣地使得外地或外國所生產的麥粉，大量並持續地輸入。



圖六、滿洲地區麥粉出口與小麥進口關係，1896-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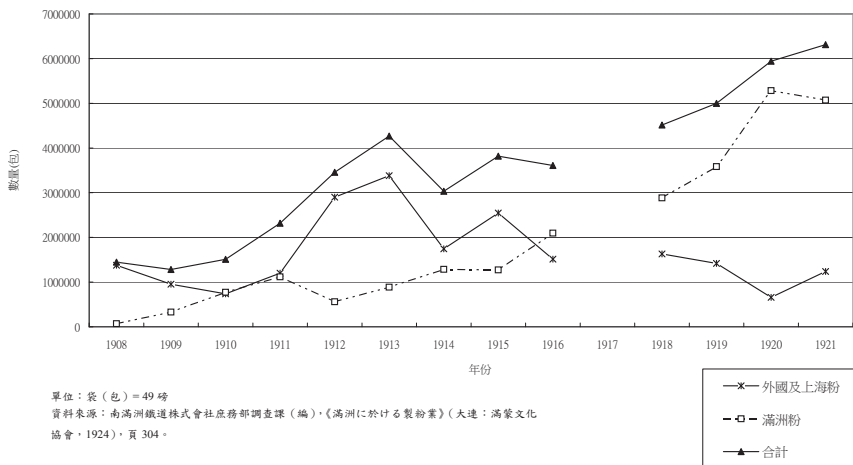
問題是，近代滿洲在20世紀初期，為何會從小麥出口、麥粉出口的情況，轉而只成為仰賴從外省、外國進口小麥與麥粉的市場結構？滿洲地區的製粉產業到底發生何種問題導致這樣的發展？另一方面，米穀貿易的成長本來以進口為主，但進口米穀的數量下降的同時也出現米穀出口成長的現象，這當中到底滿洲地區的米穀市場結構出現何種重要的變化？從上述的統計數據的推估，無論是米穀還是麥粉、小麥，問題應該是發生在1920年代初期，甚至是整個1920年代。部份原因，可能與滿洲製粉工業發展問題，密不可分。

### 三、依賴市場機制的製粉業

滿洲地區製粉業的發展與其他中國以及東亞地區相似，也經歷從傳統磨坊轉化至蒸汽磨坊，以及到製粉工廠的過程。例如，約至1900年左右，奉天、鐵嶺、長春等地共有約760多家傳統磨坊，但這個數字在往後的年月裡逐漸地縮減。<sup>22</sup>相對地，製粉工廠的興起就在20世紀的頭二十年，而滿洲地區能在製粉業佔有長速的發展，多靠外籍人士的提倡，使得現代企業能建立、現代技術能引進。

從1900年代開始，俄羅斯資本首度進入滿洲地區，日資、華資則跟隨其後到滿洲設廠。<sup>23</sup> 對俄羅斯人來說不幸的是，他們在遠東地區經營製粉業面臨到極大的困難，包括貨幣波動與日俄戰爭後一直到1920年代初期俄國對於日本的敵意與對遠東的關稅政策等。大部份的俄羅斯籍製粉工廠大多集中在哈爾濱，從1900年代到1910年代也就逐漸地轉移到華商手上。製粉業到了1910年代至1920年代，因為部份在北滿的製粉工廠為了面對日漸增強的市場競爭而遷往南滿地區，使製粉業有進一步的調整。<sup>24</sup>

雖然經營上有起有落，但滿洲地區的製粉業還是在1920年代初期以前，有一定的成長。根據一項研究顯示，在1913年滿洲地區約有17家華資、40家外資製粉工廠，總生產力可達每日112,224包；到1921年製粉工廠約有57家華資、11家外資，總生產力可達每日131,919包。<sup>25</sup> 此外，在滿洲地區存在數目龐大、使用舊式動力的「磨坊」，它們在1923年約共985家，全年總生產力可達45萬關擔。<sup>26</sup> 這些不同型態、國籍的生產商，使得滿洲地區成為中國甚至東亞地區製粉業的重鎮之一。這些滿洲的製粉工廠（包括日商、華商與歐美商人在內）從1908年至1921年為止，其發展甚至能在1920年代初期以前抵禦從外地與外洋進口的麥粉。這可從圖七中「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調查部門所調查的數字中窺見一斑。表中南滿洲製粉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快速成長，不單只在數量上大幅增加，更在南滿洲消費市場上所佔的比例不斷擴大。到了1920、1921兩年，達



圖七、南滿洲機器製粉消費額，1908-1921

到南滿洲地區消費量的八成，遠遠地超越外國與上海輸往滿洲的麥粉量。

問題是當滿洲製粉業在產量上成長時，是否有在組織上進行調整，以迎接可能的擴大經營範圍或面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在滿洲地區在製粉業（包括「製粉工廠」與「磨坊」）剛發展的1900年代末，各地小麥貿易與其他穀物貿易類似，通過地方市場進行交易，在製成麥粉後除了在本地銷售外，也可沿河流或新建的鐵路沿線分銷。<sup>27</sup> 至於市場參與者方面，除了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之外，尚包括當地釀酒坊（所謂「燒鍋」）、油房、磨房、具有店面或貨倉的「雜貨鋪」、「棧房」、「糧舖」、以及流動性高的商人（包括在地方市場代客採購的「老客」或單純作為仲介的「經紀」）等。<sup>28</sup> 製粉業者依賴這些市場仲介，以達成採購與銷售的目標。

這種依靠市場仲介進行採購的情況，到滿洲製粉業的黃金時期「1910年代」仍然存在，只是增加不同的市場仲介而已。當時滿洲的製粉工廠（如日資的「滿洲製粉株式會社」）採購原料小麥大多「直接從農家買入」，或透過當地華商代理採購，或向當地的糧食收購與儲存機構，也就是「糧棧」，進行採購。<sup>29</sup> 在哈爾濱、長春，據說外商還有「特產組合」與「雜穀商組合」等組織，作大宗小麥交易的場所。<sup>30</sup> 雖然也有製粉工廠「派出張員往東支（鐵道）沿線」進行採購，但這種「出張員」並不是常駐的，多視管道採購情況而定。<sup>31</sup> 到1920年代，無論是華、外資製粉工廠，均以哈爾濱、長春等地的「取引所」（交易所）為主要採購小麥的來源，附以從當地「糧棧」的採購，直接到市集採購的情況甚少。<sup>32</sup> 只是，這些採購、穀物交易活動只限於滿洲地區，使得滿洲地區的中、外資本的製粉工廠均受到當地小麥產量直接影響。<sup>3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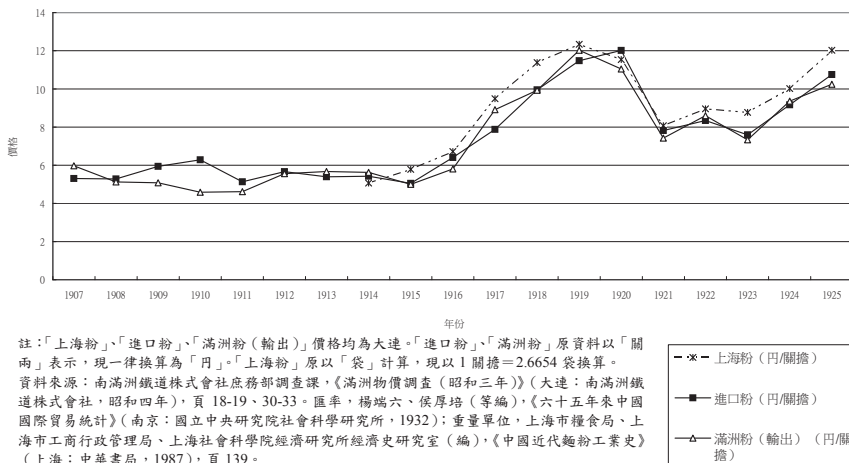
至於銷售組織方面，雖然滿洲麥粉有相當的數量輸出，其中一部份輸往華北市場，<sup>34</sup> 但1910年代至1920年代在滿洲的製粉工廠基本上依靠市場上的仲介擔任銷售機制。在哈爾濱，製粉工廠在當地的「取引所」（交易所）進行麥粉的交易，或委託「代理店」代為販售，或派「出張員」進行推銷。在開原、鐵嶺，廠商也利用「代理店」或「賣手」（推銷員）代為推銷。<sup>35</sup> 部份的製粉工廠也在「大連株式商品取引所」掛牌販售，或在奉天的「滿洲取引所」競賣。<sup>36</sup> 此外，製粉工廠也會與跟零售販賣比較接近的「麵莊」合作，批貨予麵莊、再轉售予零售的店家。<sup>37</sup> 不過，製粉工廠仍是缺乏直營的銷售機構，而依靠市場機制的

流通管道。

這種依靠市場機制、市場仲介的產銷情況，其實與外地、外洋進口之麥粉在滿洲流通的機制一樣。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滿洲，進口麥粉主要通過在大連的進口商（如日商三井物產、三菱商社〔或稱「三菱商事」〕），再經過不同層級的仲介商（如擔任中盤商、日人所謂的「問屋」，以及零售商人等），才能把商品流通到消費者的手中。但資本雄厚如三井、三菱的進口商，也還是無法漠視這些仲介商的存在。<sup>38</sup>

另一方面，這些從外地、外洋進口的麥粉，尤其是在1910年代開始來自長江下游地區所謂的「上海粉」，本身就是經過企業發展出經營科層 (managerial hierarchy) 後的物品，這個經營科層統籌原物料供應與成品銷售，使得生產規模可以擴大，甚至可以出口到滿洲販售。<sup>39</sup> 在滿洲地區與其他進口麥粉、滿洲本地麥粉之間，也就形成激烈的競爭關係。就如圖八所示，從「上海粉」出現在滿洲市場的1910年代初期到1920年代中期，滿洲麥粉市場上的「上海粉」價格波動幾乎緊貼其他兩種麥粉。當然，物價波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在經濟動盪的1920年代初期就更為複雜。<sup>40</sup> 但因為滿洲麥粉依賴在地的原料供應，要如「上海粉」在滿洲地區那樣的波動在1910年代中期到1920年代中期的趨勢，這意味著滿洲地區在相當的程度上受到長江下游地區在麥粉市場方面的影響。

無論如何，在1930年以前在滿洲的製粉業者，就算是資本最大的日資「滿洲



圖八、滿洲地區麥粉價格比較 (1907-1925)

製粉株式會社」，仍然依賴既有且受地緣關係影響的市場機制，缺乏創新以推動原料採購與產品銷售的「垂直整合」，相當地影響其生產與銷售規模。<sup>41</sup> 這與同時期以上海為中心的華資製粉企業能在市場機制與經營科層之間作出對經營最有利的選擇，建立採購與銷售管道遍佈外縣市，形成強烈的對比，也使得「上海粉」在1920年代的滿洲市場有相當的影響力。

#### 四、局部達成「垂直整合」的碾米、精米業

至於滿洲地區米穀貿易的變化對米穀貿易組織的影響，雖然在規模上比滿洲製粉業要小，但問題也相當的複雜。如前所述，清末滿洲地區可能有少數的稻米栽種與消費。根據1900年代末日本官方以及半官方（如「滿鐵」）機構的調查，雖然滿洲南北各地均有不少關於「粳米」米價以及和米貿易有關的記錄，但關於生產方面的記錄就不多，也不甚清楚。例如，滿洲北部（所謂「北滿」）稻米栽種的記錄甚少，因為當地九成的農地均用來耕種「小麥、大豆、粟、高粱」等四大作物，餘下的一成所耕作的農作有包括米在內的多種其他作物。<sup>42</sup> 而且，全北滿地區只有雙城堡（含雙城堡）、榆樹直隸廳、新城府、農安縣等地有出產稻米記錄，且栽種面積不多。<sup>43</sup> 至於滿洲地區的南半部（所謂的「南滿」），稻米耕種的記錄相對於北滿多些，但仍然是少數，只有遼陽、騰鰲堡、海城、岫巖、貔子窩、鐵嶺、海龍城、新民府、奉天、法庫門、伊通州等地有栽種記錄，且出產量也並不多。<sup>44</sup>

所以，整個滿洲地區的稻米消費除了上述的本地生產外，就是靠外來進口。例如，在北滿地區，透過河運、馬車以及新近完成通車的鐵路（如「東清鐵道」），進口當地以及從營口而來的大米。<sup>45</sup> 在南滿地區，前述1900年代末的日文資料對米價與米運輸量的報導大部份並未說明米的來源或去向，只遼陽所產稻米有在蓋平開賣，本溪湖、雞冠山、鳳凰城、永寧、鐵嶺、奉天等地有鐵路運米的記錄，法庫門有河運的記錄，在長春、雙城堡、榆樹直隸廳當地市場集散的記錄中有提到米貿易，以及安東、貔子窩、新民府、營口等地有關稻米運輸的來源（山東、上海、朝鮮等地）或運費資料。<sup>46</sup> 從這些零散的資料可見，晚清滿洲地區的流通非常少，也非常地限制在產地市場，不然就需要依靠營口的貿易

網絡與新建的鐵路沿線市場，才能取得外地米穀。

在產量少的情況下，稻米消費表現與其他「主要糧食作物」的消費情況存在明顯的差異。差異主要是在價格，因為稻米若與其他滿洲地區的主要作物（「小麥、大豆、粟、高粱」）相比較，在同一數量上稻米的價格均比其他四種高出許多。這方面，我們根據前述1900年代末的日文資料有關物價的部份而編成表二，得到清楚的資訊以證明我們的說法。如此產量少、貿易量少但又價格昂貴的稻米，在1900年代末的滿洲恐怕也只能是上層社會的高收入人士才能食用了。雖然，目前缺乏對於滿洲地區個人或家庭糧食消費習慣的深入瞭解，但如表二所呈現的現象，可能就如同 Sidney D. Gamble 在1920年代對北平華人家庭的調查所推測的，大米的消費量與收入成正比，而其他的穀類則是與收入成反比。<sup>47</sup> 這一種臆測，還需要更進一步的資料證明，因為我們缺乏1900年代末滿洲地區家庭收入的深入調查，但可能也與事實相差不遠。

表二、滿洲地區1900年代末米價與其他主要農作物價格比較

地點	大豆(元豆)	高粱	小麥	小米	米(粳米)
三姓(一石)	30吊	24吊	30吊	40吊	16吊
拉林1(一石)	32吊	18吊	30吊	35吊	85吊
拉林2(一石)	28吊	21吊	29吊	48吊	70吊
孤榆樹(一斗)	4.12吊	3.1吊	4.55吊	7.5吊	9.0吊
五棵樹(一斗)	5.1吊	3.0吊	5.3吊	7.0吊	12.0吊
農安縣(一石)	35吊	---	40吊	38吊	65吊
本溪湖(一斗)	6角	5角	1元3角	8角	1元8角
遼陽(一斗)	6角3分	5角2分	1元3角	7角	1元4角
騰鰲堡(一斗)	8角3分	6角9分	1元5角	7角8分	1元7角
海城(一斗)	7角5分	5角7分	1元5角	8角3分	1元6角
岫巖1(一斗)	---	5.4吊	---	10.5吊	16.5吊
岫巖2(一斗)	---	1.35元	---	2.1元	2.55元
蓋平1(一斗)	7.6吊	6.4吊	14吊	8.3吊	16吊
蓋平2(一斗)	1元5角3	1元6角	---	2元1角	3元3角
城廠(一斗)	9角3分	---	1元6角	1元8角	3元2角
安東(一石)	17元	15元	---	19元	29元
北山城子(一斗)	10.1吊	5吊	9.1吊	---	18吊
大肚川1(一斗)	1元50仙	80仙	1元58仙	1元10仙	2元80仙



地點	大豆（元豆）	高粱	小麥	小米	米（粳米）
大肚川2（一斗）	2元	0.7元	1.3元	0.9元	2.6元
大疙瘩1（一斗）	1元40仙	70仙	1元60仙	---	2元50仙
大疙瘩2（一斗）	1.3元	0.6元	1.0元	1.1元	2.5元
掏鹿1（一斗）	9.5吊	5.1吊	12吊	7.2吊	2元40仙
掏鹿2（一斗）	10.25吊	5.2吊	9.6吊	8.0吊	2元25仙
奉天（一斗）	6.5吊	4.6吊	9.0吊	7.4吊	12.1吊
八面城（一斗）	1.19元	0.80元	1.44元	1.50元	2.13元
奉化（一斗）	1.60元	0.76元	1.38元	1.42元	2.27元
伊通州（一斗）	0.93元	0.62元	1.10元	1.45元	2.35元
吉林（一斗）	0.71元	---	0.96元	1.25元	1.75元

資料來源：外務省，《北滿洲之產業》（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明治四十一年），頁150-152；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續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明治四十四年），頁40-41、83、89、148；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明治四十二年），頁21-22、99-100、112、138、156、218；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壹》（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大正元年），頁118、168；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二》（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明治四十三年），頁105-106；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三》（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明治四十四年），頁57、110、114-115、129-130、135、147-148；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四》（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明治四十四年），頁111；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五》（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明治四十四年），頁11、27、69、186。

對於這些少量米穀的流通，在1900年代末的滿洲地區，就如同前述的小麥以及其他（細糧）穀物貿易，通過地方市場進行交易。市場參與者方面，除了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之外，尚包括當地釀酒坊、油房、磨房、具有店面或貨倉的「雜貨舖」、「棧房」、「糧舖」、「糧行」、以及流動性高的商人（包括在地方市場代客採購的「老客」或單純作為仲介的「經紀」）等。<sup>48</sup> 不過，或許因為米穀貿易數量實在太少，在1900年代的日文記錄中，並沒有出現專門以碾米為業的「碾米業者」。畢竟，稻米栽種在當時尚屬少數，雖然有朝鮮人在光緒34年開設「稻田公司」嘗試開墾土地以栽種朝鮮米（屬於粳米），但收成後販賣與碾磨則不在其經營範圍之內。<sup>49</sup> 所以，通過這些市場參與者的米穀可能經過買賣的商人稍加處理，或者還是到消費者手中再自行加工處理。

在緊接著的1910年代因為滿洲地區開始生產米穀而出現重大變化，首先是水田的開發。雖然朝鮮人在1880年代已經進入滿洲地區的通化縣進行開墾水田的事業，並為當地華人所效法，但更大規模地把水田耕種的方式引進滿洲是在

1900年代末、1910年代初。<sup>50</sup> 在1909年，日人大江惟慶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在撫順的「鐵道附屬地」上開發水田，遂後又有其他日人在奉天的「鐵道附屬地」開墾水田，一時成為風氣。<sup>51</sup> 不過，開發主不只日人、朝鮮人，更多的是華人。到1914年為止，南滿洲的水田面積已經超過5300町（1町約等於11平方米），其中華人經營的部份達到59.21%，比起第二大的經營者朝鮮人的35.78%要高出許多，日人則佔5%左右。<sup>52</sup> 至於北滿地區，在1914年的調查裡據說水田面積已達到全黑龍江、吉林兩省的「相當約千分之九」。<sup>53</sup> 同時，就連商業程度最高的營口，也出現朝鮮人移住並進行水田栽種事業的例子。<sup>54</sup> 這些不同的族群所栽種的品種雖然同為「粳米」類，但各有不同。「日本人所經營之物種皆以相同的日本米作生產」，而在滿華人則「生產在來種」。<sup>55</sup> 這些各種不同的稻米，使滿洲地區的米產能在1910年代中成為全滿洲米穀總量（生產與進口）的80%以上。<sup>56</sup> 甚至有來自日本大資本貿易商在大連、營口、奉天、長春、哈爾濱等五個重要城市設店經售「滿洲米」。<sup>57</sup>

滿洲米的產量提升，使得貿易組織的結構也因此開始改變，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米穀加工業的出現，現代漢語中稱為「碾米業」的，相約日文中的「精米業」。「碾米」或「精米」簡單來說就是把在農場收割、打穀後的稻穀，再用機器處理把外殼磨除，但米粒上仍然有薄皮「糠」，成為「糙米」。若薄皮再加以碾磨清除，就成為「白米」（或「精米」）。<sup>58</sup> 雖然滿洲地區最早的精米廠是在1909年成立，由日籍企業「大矢組精米所」經營，<sup>59</sup> 但更多的「精米所」要在接下來的1910年代才大量地出現，而且不限於日籍企業。例如，在1916年左右部份華商經營的「精米舖」內，開始加蓋小型的「精米所」。<sup>60</sup> 在整個1910年代的十年裡，據說各地共有超過80所「精米所」，滿洲精米業可謂達到盛況。<sup>61</sup> 根據1917年日本農商務省所出版的調查，滿洲的日籍精米業者直接買入稻穀（日文所指的「粳」）再碾白，但在滿華商業者與其他關內各省的碾米業者習慣相近，在初步碾米後尚餘薄皮的「糙米」，在要精白後才能以「白米」販售予零售商或者是消費者。<sup>62</sup> 所以，在滿洲日籍精米業者可更直接與生產者、消費者接觸，建立一種「垂直整合」的型態。而在滿洲華商業者則提供生產「糙米」與「白米」的兩個工作程序，但其中的過程則尚須另有仲介機構協助相關的米穀流通、銷售等過程。

但到1920年代初期，滿洲精米業發展急轉直下，從1910年中期的超過80所萎縮到只剩下22所，分佈於大連、撫順、鐵嶺、開原、公主嶺、奉天、長春、營口、吉林、安東等主要城市與市場，絕大部份為日人所辦，以及一所為朝鮮人經營，華商也等於退出精米、碾米市場，並維持到1920年代後半。<sup>63</sup> 這些精米所所依靠的原料，大部份是滿洲所產的稻穀，以及少數的朝鮮稻穀。<sup>64</sup> 可以說，到了1920年代滿洲地區米穀貿易組織，透過華商退出精米、碾米市場，使米穀加工業完全留下日本人經營的、比較達到「垂直整合」的精米所。

滿洲精米業的發展趨勢，很可能與當地各類移民對米穀消費的習慣有根本的關係。在滿洲日人與朝鮮人食用精米時，一如在日本或朝鮮半島，是以飯粒方式食用。但在滿洲華人只有社會上層人士才多食用白米飯，一般民眾不是用米煮粥，就是把米與小麥一起磨粉後食用。<sup>65</sup> 有些農村地區，大米根本只有在每年的節慶上使用，並常以「粥」的型態出現，祭典上的象徵意義大於食用意義。<sup>66</sup> 1920年代滿洲地區的農家經濟調查也顯示，當地華人農家花費在大米上的費用微乎其微，反而對於麥粉、小米、高粱等糧食的開銷較重。<sup>67</sup> 至於朝鮮人、日本人農家雖然米食也不是食品開支中最大的項目，但還是與華人農家的微量食用成為強烈的對比。<sup>68</sup> 所以，儘管華人在滿洲的新移民人數眾多，但對於米食消費的影響恐怕並不大。反而日漸增加的朝鮮、日本新移民因為相對地習慣食用米食，加上人口又不斷增加，故對於滿洲地區大米的消費構成絕對性的影響。<sup>69</sup> 根據一份昭和七年出版的調查顯示，滿洲華人米穀消費推估只有10萬石，但在滿日人（民間）則達到24萬石，另有1萬餘石推估為在滿日本陸軍所需，可見這些日（鮮）移民對滿洲米穀消費遠比華人需求的還要大。<sup>70</sup>

當然，滿洲米穀的貿易結構，並沒有因為精米所的發展而受到影響。根據一份1920年代後半出版的調查顯示，滿洲米穀貿易依舊存在仲介商人（糧棧、米行、米店等），但「日本米穀商人也會派人員到產地直接與貯穀者（囤戶）談判」或透過地方的仲介商人採購，而朝鮮商人多以賣方與買方聯絡進行交易。<sup>71</sup> 至於華人方面大致與前述的1900年代末的相似，各地農民先把米穀售予在地的米店（或「店」），再由米店取樣交予買方察看，如同意品質後再行決定交易細節。<sup>72</sup> 精米所基本上依賴市場仲介，以購入稻穀來進行加工生產。

除了這些原有的市場仲介外，1920年代後半的滿洲米穀市場，尚有在1924年

由日本人發起並經營的奉天「滿洲取引所」，其中包含本地與外地、外洋所產的稻米交易，讓米穀商人可做大宗交易。<sup>73</sup>不過，「取引所」因為有「精米」與「粳」兩種掛牌販賣，等於精米業者也參與其中。可以說，滿洲米穀的交易大致上就如同滿洲製粉業一樣的保持利用市場機制進行採購與銷售，實際上卻因為精米所並沒有直營產銷而並未達到表裡相符的整合，與製粉業一般的依靠市場仲介，只是在製造過程中因為飲食習慣而達成部份的「垂直整合」而與製粉業的發展有所區別。

滿洲米穀貿易結構的特殊性，可能與它的外地、外洋米穀進口貿易與商業結構有一定程度上的關係。根據1910年代中期的日人調查所示，滿洲進口的外國米穀主要來自朝鮮、法屬印度支那以及英屬印度的緬甸，透過大連、安東與營口進入滿洲，而且這些「外米」在大連、安東、琿春等地成為主要的進口米，反而中國米則只有在營口、延吉、綏芬河佔主導地位，而且在愛琿中國米的主導地位也後來轉讓予「外米」。<sup>74</sup>到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滿洲地區透過海關所進口來自外地、外洋的米穀，就如同表三所示的從原先多依賴中國其他各地所產（如前述的山東、上海等），漸漸轉為以外國進口為主。少量中國其他省份的米也透過中式帆船（「戎克船」）進口，<sup>75</sup>但大部份進口的米穀均依賴輪船輸入滿洲。

表三、滿洲地區外地、外洋米穀進口量，1919、1927-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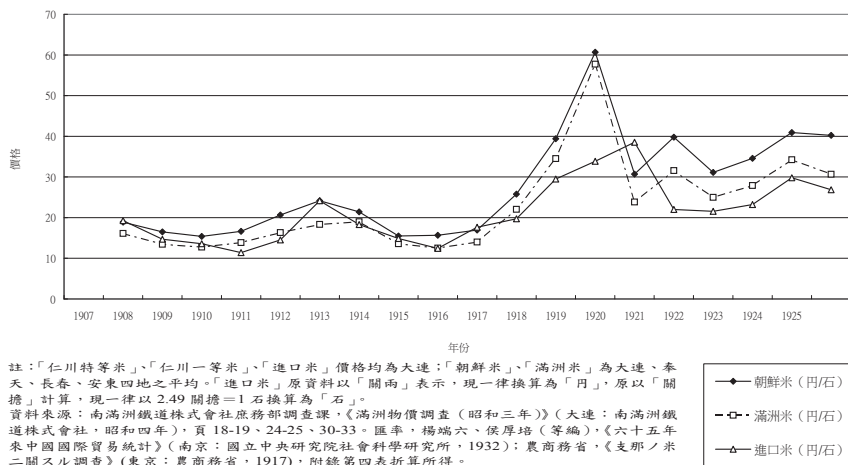
年度	進口外國米穀	進口米穀總數	外國米穀佔進口米穀總量百分比
1919	154911	521141	29.73
1927	210303	326616	64.39
1928	200015	338051	59.17
1929	194290	272728	71.24
1930	367375	421275	87.21
1931	279254	387382	72.09

單位：關擔

資料來源：Inspectorate 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96-1931* (Shanghai: Office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97-1932), Manchurian ports; 蔡謙、鄭友揆(編),《中國各通商口岸對各國進出口貿易統計(民國八年,十六年至二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102-103。

「外米」中特別重要的是朝鮮米，因地理關係而對滿洲米食從1900年代末開

始就構成影響。不單有前述的朝鮮農民移入開墾水田，更有華商、日商爭相收購朝鮮米以輸出滿洲與華北。<sup>76</sup> 這種情況在1910年代持續運作，朝鮮米穀從仁川直接輸往大連、營口，或從新義州經陸路達長春、哈爾濱等地；朝鮮米對滿洲米價影響的重要程度，甚至被看成能影響滿洲的米價。<sup>77</sup> 事實上，朝鮮米對於滿洲地區的米價影響甚鉅，就如同圖九所示滿洲地區的米價，因為「滿洲米」本身與朝鮮米同屬「粳米」，與從東南亞進口的「秈米」有差別，所以長期以來「滿洲米」與「朝鮮米」的價格波動基本上呈現一致的狀態。圖九中的「進口米」因為是中國海關對所有進口米穀價格的平均計算，內中包含經過海關的「朝鮮米」與東南亞米，所以價格趨勢雷同，但若仔細觀察，則會發現「進口米」的價格走勢與「滿洲米」、「朝鮮米」的價格趨勢在一些關鍵年份出現明顯的差異，反映其背後所受到的影響不盡相同。「朝鮮米」始終是影響滿洲地區米價的一個重要因素。



圖九、滿洲地區米價比較（1907-1925）

這些朝鮮的精米業者，其實是在朝鮮開港以來，來自日本的精米業商人，投資新式精米機器開始，並與朝鮮人既有的「舂摺」（從稻穀成為糙米的過程，也就是碾磨）業，形成雙元的產業結構。<sup>78</sup> 最初，滿洲的「輸入商多與仁川、義州、鎮南甫、郡山、斧山等之精米業者或米商聯絡交易」，也有「朝鮮之精米業或米商在輸出地推銷」。<sup>79</sup> 到了1910年代中期，只剩下「仁川的精米業設

置出張所為米販賣之用」，而在滿洲也只有少數進口商（如大連的「奧田商店」、「馬場商店」）仍然維持「兼營精米業」。<sup>80</sup> 反而，在同時期的大連、奉天、長春、哈爾濱各處均可見大資本企業「三井洋行」（即「三井物產」）先與朝鮮各地的精米業者訂定契約，運載朝鮮米往滿洲販售，再轉售予零售商人販賣；或者是為數眾多的雜貨店，在兼營其他生活用品的同時兼賣朝鮮米。<sup>81</sup> 無論是透過大資本企業還是小資本的雜貨店，1910年代的朝鮮米一旦進入滿洲市場後也甚少出現整合的產銷機制。到1920年代後半、1930年代初，朝鮮內部米市場所存在的「精米業」與「粳摺業」之爭逐漸明朗，前者也逐漸佔上風，並促成大規模生產模式，也使「精米」取代「玄米」（糙米）而成為「滿洲國」成立前朝鮮米出口的主要型態。<sup>82</sup> 這種發展，也就與滿洲的碾米業、精米業之發展十分類似，只是其過程並沒有被在滿洲的消費者看見而已，也因為「滿洲米」的逐漸成長而減弱朝鮮米對滿洲米市的影響。<sup>83</sup>

在滿洲米食比重較少的另一種「外米」是來自東南亞地區，包括前述的法屬印度支那（安南）以及英屬印度的緬甸，在1910年代的記錄中，多透過香港轉運、採購。<sup>84</sup> 香港在近代東亞貿易網絡中的重要性，早已為學術界所共知，在米穀貿易上更是連接東南亞、東北亞與中國市場的橋樑。<sup>85</sup> 在1910年代中期，香港便成為滿洲地區進口安南與緬甸大米的來源，經大連而運銷至「奉天以北哈爾濱迄」的區域，<sup>86</sup> 往後尚有進口暹羅米（如表四所示）。

表四、滿洲地區外洋米穀進口量，1919、1927-1931

年份	香港	安南	印度	暹羅	日本	其他	總量
1919	24				8325	146562	154911
1927	123719	9387	19437	14923	43779	13981	210303
1928	139834	4181			32027	9050	200015
1929	155544	13225	1142		12468	11911	194290
1930	174776	14783	23184		134190	20442	367375
1931	33184	1666	3841		236360	4203	279254

單位：關擔

資料來源：蔡謙、鄭友揆（編），《中國各通商口岸對各國進出口貿易統計（民國八年，十六年至二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102-103。

這些來自東南亞的米穀，無論是直接由產地出口，或是經過香港轉運，大致

上仍是以兩個貿易網絡進行。第一個貿易網絡是透過華商的商業網絡，這些東南亞華商從19世紀後半開始便參與當地米穀收購、加工、出口等事業，延伸商業網絡從東南亞至東北亞，甚至到長江中游、滿洲等地區。<sup>87</sup> 第二個貿易網絡是透過日商的企業組織，尤其是在1910年代開始，日商（如湯淺商店、鈴木商店、三井商店等）均有派員駐在東南亞各地與香港，甚至有定期航班，經營米穀輸往日本或東北亞。<sup>88</sup>

不過，這兩個貿易網絡雖然有不同的組織與商業技術，但均進口不同種類與國籍的東南亞米到滿洲（以及其他東亞各地），而並非對某一種米穀的生產與販售進行「垂直整合」以達成市場上的成功；日籍企業（如前述的「三井」）本身甚至同時也經營朝鮮米與「滿洲米」的貿易，華商也可能同時成為經營其他雜貨的商人聯盟「南北行」的成員，<sup>89</sup> 但華商的「聯號」模式在滿洲的米穀貿易與加工業之中也並不明顯。可以說，東南亞米在滿洲的銷售並不是單純因為一種商品的販售，而是一項服務（有多種選擇的貿易）中的一個環節。而當滿洲的米穀加工業從1910年代的精米、碾米並存的結構，轉化到1920年代碾米業的萎縮與獨存部份達成「垂直整合」的精米業，從外地外洋進口的米穀貿易機制也相對地缺乏變化。

## 五、結論

本文透過探討近代滿洲糧食市場中的米穀與麥粉兩種物品的貿易變遷，論述滿洲在貿易量方面雖然有明顯成長，但到1920年代初起開始走向停滯，且長期以來以進口為主，就連滿洲本來擁有優勢的小麥貿易也在1920年代走下坡。進口的麥粉與米穀，對滿洲當地的麥粉與米穀貿易組織卻存在不同的互動狀況。大量進口的麥粉雖然在滿洲製粉業發展的初期成為催生糧食加工業的基礎，但後來反而成為從本國與外洋進口者在滿洲競爭的實證。至於進口的米穀，卻成為滿洲米穀農業發展的契機，甚至出現逐漸壯大的米穀出口。我們亦發現滿洲的米穀與麥粉商業組織出現兩種不同的發展型態，一是麥粉貿易中製粉業在原料採購到產品銷售，均依靠市場機制，透過市場仲介進行交易，使得在體制上容易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更不容易面對在同時期從上海進口的麥粉之競爭，

因為長江下游地區出現製粉企業的「垂直整合」，使得滿洲麥粉市場也因此備受壓力，也漸漸在「上海麥粉」的壓力下經營。這些經營與經濟的因素影響下，滿洲地區的製粉業在1920年代漸漸衰落，發展明顯地受到上海與長江下游地區的牽制，市場空間逐漸受到壓縮，要到「滿洲國」建立後才出現另一次的轉變。<sup>90</sup> 二是在滿洲米穀貿易中（包含滿洲米、朝鮮米）之碾米、精米工廠與相關米商，「聯號」模式並不明顯，日商貿易商社也經營多元商品，並不專營米穀貿易，卻因為滿洲地區移民飲食習慣的關係，出現具有部份達成「垂直整合」的精米業，而不是代客碾米為主或由米商、糧行兼營的碾米業，使得滿洲的米穀貿易的商業組織，呈現與長江下游、廣東等地區有明顯的差別。

上述關於20世紀初滿洲糧食貿易及其商業組織變遷的分析，對於我們理解近代中國的貿易發展與商業組織變遷又有何關聯？先就麥粉貿易而言，滿洲地區在面對貿易發展的時候，依賴既有的市場機制與仲介，反而並沒有發展出如同部份長江下游的製粉工廠一樣的「垂直整合」，這種麥粉市場的結構在同一個時代的中國並不特別。因為，在同時期的另一個製粉業中心上海及長江下游地區也存在依靠市場機制流通商品的結構。但兩者差別在於上海與長江下游地區製粉企業發展出經營科層 (managerial hierarchy)，用以統籌經過市場機制以及企業管理下的兩種原物料供應與成品銷售系統，使得生產規模可以擴大，甚至可以出口到滿洲販售。反觀滿洲地區雖然擁有天然資源與合適的氣候，更有過去被認為的雄厚資本的外資（先是俄資，後有日資）進行生產投資，卻沒有企業組織上的突破。這當中顯示的問題恐怕不單是企業經營策略的優勝劣敗，也有可能是與滿洲地區諸如金融體系、市場結構、企業體系如何影響著各方資本的競爭。本文因為篇幅所限，這些複雜的因素也就必須留待日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有更多的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滿洲麥粉市場的倒退不是單單成為長江下游地區製粉業拓展事業至滿洲這個硬幣的另一面，而可能反映在中國的華資、外資企業與貿易商之間的不同的企業發展與演變。

至於滿洲米穀貿易及其商業組織變遷中，卻出現在長江下游與華南地區存在差異的結構。雖然，滿洲地區的米穀貿易組織因為米市規模相對小而大部份仍然需要依靠市場仲介，但卻發展出與中國各地米業「分散繁衍」不一致的型態，尤其是精米業從購入稻穀到碾成白米均在精米所掌控下進行，而非讓算是半製



成品的「糙米」（「玄米」）在市場上流通。當然，這個過程中並沒有產生明顯的整合作用，但也使滿洲米業減少販售（或投機）半製成品的市場仲介，並成為中國近代米業發展史上少見的趨勢。這些滿洲的米穀加工業者到1920年代只留下日人經營的單元，但這當中顯示問題並非能單以近代日本對滿洲的政治影響力而決定，而更可能與滿洲地區開發史的背後存在其他諸如財富分配不均、移民／殖民的性質等因素，需要日後對滿洲地區移民／殖民有更多的研究。

不過，滿洲地區無論是米穀還是麥粉，日人也有經營、甚或是開發，但從製粉業的例子可見，政治力量並不一定能轉化成經濟力量，最終在1930年滿洲製粉業中的外資幾乎全軍覆沒。而且，1930年代以前在滿洲日商也有進出口商社在當地進行採購小麥與銷售麥粉業務，日資製粉工廠卻並沒有與這些日資貿易商社作更進一步的整合，這其中牽涉到個別貿易商社在滿洲地區甚或是整個中國或東亞的經營策略問題。另外，水田開墾中雖然日人所扮演的角色甚為重要，但在滿洲的朝鮮人與華人卻又同樣重要，這當中恐怕需要進一步的資料才能深入討論。

若進一步把滿洲地區米穀與麥粉貿易投放回中國甚至東亞的歷史脈絡中的話，在近代滿洲這種新開發的地區，糧食貿易的變遷本來就是多變的，更無可忽視的是外來移民帶來或引進小麥與米穀，卻又是按照各自的習慣與經濟能力來消費。在這個過程中，雖然貿易網絡均跨越中國沿海、東北亞，甚至米穀貿易還延伸到東南亞，但基本上還是以滿洲地區為消費中心，並非如長江下游地區在作為消費市場的同時尚具糧食貿易中繼的功能。相反地，長江下游地區的糧食貿易網絡卻延伸到滿洲地區，並在1920年代重重地影響著滿洲麥粉市場。另一方面，因為新移民飲食習慣的關係，使滿洲地區米穀貿易與長江下游、華南地區甚至東南亞也呈現距離，但與地緣關係密切的朝鮮半島相連結。這種現象，可以說剛好與華南地區成對比，因為當地的米穀市場與東南亞米穀產地發展出緊密的貿易網絡，麥粉卻重重受到上海方面的影響。明顯地，滿洲地區的糧食貿易充分反映當地在移民／殖民的影響下的型態，也反映出20世紀初期東亞各區域之間複雜的經貿關係。

總而言之，近代滿洲地區米穀與麥粉的貿易及其商業組織的變遷，與過去關於長江下游、華南地區研究成果所顯示的發展不盡相同，滿洲所發展的製粉業

並沒有如長江下游的製粉業所產生的「垂直整合」，滿洲的米業卻出現部份的整合而不如華南或長江下游米業的「分散繁衍」。當中不單反映滿洲地區在近代經濟開發過程中米穀產業的發展特殊，以及製粉產業發展的侷限，更反映滿洲地區存在複雜的經貿與社會關係，這些面相均是我們對滿洲歷史認識不可忽略的。

#### 註

- 關於滿洲開港與移民政策問題，見林士鉉，《清季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胡赤軍，《近代中國東北經濟開發的國際背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關於滿洲移民狀況，見范立君，《近代關內移民與中國東北社會變遷(1860-193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馬平安，《近代東北移民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B.A. Romanov (trans. by Susan Wilbur Jones), *Russia in Manchuria (1892-1906)* (Ann Arbor, Michigan: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52); Thomas Richard Gottschang, *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 Economic History, 1891-1942* (Ann Arbor, Michigan: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and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本文之研究基礎，是得到中華民國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下列研究計劃所奠定，筆者特此致謝。其中包括「清代糧食貿易的組織與金融」(與王業鍵共同主持)(NSC89-2411-H-001-062)、「近代中國糧食貿易網絡發展與商業組織變遷，1870-1936, I & II」(NSC91-2411-H-029-011與NSC93-2411-H-029-007)；「近代長江下游地區糧食貿易中的融資結構之研究，1870-1936」(NSC95-2411-H-029-005)以及「近代滿洲地區糧食貿易與商業組織變遷：米穀與麥粉之比較研究，1870-1930」(NSC101-2410-H-006-068)。又，在本文撰寫過程中，與本研究淵源甚深的王院士業鍵先生高齡仙逝，筆者只好以本文作為紀念，並感謝其對晚輩提拔之恩。
- 雷慧兒，《東北的豆貨貿易(一九〇七-一九三一年)》(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1)；衣保中，《東北農業近代化研究》(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頁180-202；于春英、衣保中，《近代東北農業歷史的變遷(1860-1945)》(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9)，頁30-37。
- 孔經緯(主編)，《清代東北地區經濟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頁410-413；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上海：中華書局，1987)，頁228-253。
- 陳計堯，〈近代中國的開港、工業化與通商口岸之糧食消費的變遷(1870-1936)〉，海洋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2)，頁221-290。
- 在現代漢語的用詞中，製造小麥粉的工廠常被稱為「麵粉廠」，而在現代日文中則稱為「製粉所」，為避免讀者的困擾，本文除了專用的稱呼之外，一律將用「製粉工廠」稱之。
- Kai Yiu Chan, "The Rice and Wheat Flour Market Economies in the Lower Yangzi, 1900-1936", in Billy K.L.

- So and Ramon H. Myers, *Treaty Port Economy in Modern China: Empirical Studi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Berkele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1), pp.75-95; the same auth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ain Market in Modern Shangha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ice and Flour Trade, 1900-1936", *East Asian Economic Review* (東アジア經濟研究：京都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付屬上海センター研究年報) (Shanghai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Kyoto University), Vol.1, 2006 (March 2007), pp.111-135.
- 7 Kai Yiu Chan, "Business Finance in the Grain Trade of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70-1936", in *Social System Studies* (社會システム研究), No. 25 (September 2012), pp.1-29.
  - 8 陳計堯,〈廣東糧食貿易及其經營(1900-1937):米穀與麥粉〉,陳明鈔、饒美蛟(主編),《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係1900-1938》(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頁221-238。
  - 9 Norman Shaw, *The Soya Bean of Manchuria*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pecial Series, No. 3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1).
  - 10 駒井德三,《滿洲大豆論》(札幌:東北帝國大學農科大學內カメラ會,明治四十五年);拓殖局,《大豆ニ關スル調査》(東京:拓殖局,明治四十四年)。
  - 11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247-265;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 第一卷 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72-282;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343-390;龍登高,《江南市場史——十一至十九世紀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頁81-96。
  - 12 滿洲特產中央會,《歐洲に於ける滿洲大豆其の他の取引事情》(新京:滿洲特產中央會,昭和11年);神戶商工會議所(編),《滿洲の大豆》(神戶:神戶商工會議所,昭和十八年)。
  - 13 Shannon R. Brown, "Cakes and Oi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hinese Soybean Processing",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3, No.4 (Oct., 1981), pp.449-463.
  - 14 于春英、衣保中,《近代東北農業歷史的變遷(1860-1945)》,頁45。
  - 15 沈宗瀚,《中國農業資源》(全二卷)第二卷(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頁8、105。
  - 16 王建中(主編),《東北地區食生活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204-221。
  - 17 關於朝鮮人在滿洲,見王建中(主編),《東北地區食生活史》,頁223-237;關於華人在「皇莊」、「旗地」等問題,見烏廷玉、張雲樵、張占斌,《東北土地關係史研究》(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頁39-95;孔經緯(主編),《清代東北地區經濟史》,頁89-127;孔經緯,《東北經濟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頁5-10、14-36;習書仁、衣興國,《東北近三百年土地開發史》(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 18 關於清代的糧價陳報制度,見王業鍵,〈清代的糧價陳報制度〉,《故宮集刊》第十三卷第一期(1978

- 年), 頁53-66; 關於滿洲的糧價單, 筆者是參考由已故王業鍵院士提供他所整理的「清代各省糧價清單中的糧食種類」(未刊資料), 筆者在此感謝王院士提供是項資料。
- 19 孔經緯 (主編), 《清代東北地區經濟史》, 頁103。
  - 20 遼寧省檔案館 (編譯), 《盛京內務府糧莊檔案匯編》(瀋陽: 遼陽書社, 1993) (上下冊)。
  - 21 孔經緯 (主編), 《清代東北地區經濟史》, 頁165。
  - 22 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 《滿洲に於ける製粉業》(大連: 滿蒙文化協會, 1924), 頁157。
  - 23 原道之, 《滿洲に於ける小麥粉》(大連: 滿洲輸入組合聯合會商業研究部, 1937), 頁3-5;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 《滿洲に於ける製粉業》, 頁87-88; 哈爾濱滿鐵事務所 (編)、湯爾和 (譯), 《北滿概觀》(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37), 頁623-624。
  - 24 見佚名, 〈東三省麵粉產銷情形〉, 《中外經濟週刊》, 第20號 (1923年7月21日), 頁4-18; 佚名, 〈哈埠製粉業擬向南滿遷移〉, 《工商半月刊》, 第3卷第1期 (1931年1月), 「國內經濟事情」, 頁9-10。
  - 25 見上海市糧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 (編), 《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 頁33-35, 48-51, 66-69。
  - 26 原資料滿洲各地磨坊每年生產力共約50,577,000斤, 換算後約455,409關擔。關於生產力與家數, 參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 (編), 《滿洲に於ける製粉業》, 頁158-159。關於換算率, 參見 Author unknown, “Chinese Flour Industry, 1930”, esp. p.112; 〈黑河之麩粉業〉, 《中外經濟週刊》, 第227號 (1927年9月3日), 頁13-20, 特別參見頁14-15;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1*, “Table of Chinese Weights”。
  - 27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編), 《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明治四十二年), 頁15、65;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編), 《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壹》(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大正元年), 頁38、45;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編), 《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二》(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明治四十三年), 頁184、192;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編), 《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三》(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明治四十四年), 頁19-20、43、91、107、124-125、144、169;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編), 《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四》(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明治四十四年), 頁30、65、125、168;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編), 《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五》(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明治四十四年), 頁23、34、66、155;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編), 《續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明治四十四年), 頁23-25、55-56、82、89、108、124-125、128-129、133-134、147-149、171。
  - 28 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編), 《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明治四十三年), 頁66-69。
  - 29 安原美佐雄, 《支那の工業と原料, 第一卷, 下》, 頁646、649; 滿鐵調查課, 《滿洲に於ける糧棧——華商穀物問屋の研究》(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1931)。

- 30 參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滿洲に於ける製粉業》，頁190-191、193-197。
- 31 參見橫濱正金銀行調查課，《哈爾濱を中心としたる北滿洲特産物》，頁164。
- 32 哈爾濱市工商聯合會，《哈爾濱製粉業史料》（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企業史資料研究中心所藏「企業史、行業史資料」，第19卷），頁29-31。關於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滿洲糧棧的情況，見滿鐵調查課（齋藤征生），《滿洲に於ける糧棧——華商穀物問屋の研究》（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昭和六年）；橫濱正金銀行頭取席調查課，《開原糧穀取引事情》（東京：橫濱正金銀行頭取席調查課，昭和三年）；哈爾濱鐵路局北滿經濟調查所，《北滿糧棧調查 第二編》（哈爾濱：北滿經濟調查所，昭和十二年）。
- 33 最重要的一次直接影響，發生在1923年。參見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922-31* (Shanghai: Office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933), Vol. I, "Harbin", p.214.
- 34 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誌，第十八卷：直隸》，頁748-749；安原美佐雄，《支那の工業と原料，第一卷，下》，頁720-721。
- 35 參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滿洲に於ける製粉業》，頁179、183-189、193-195、197-199。
- 36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滿洲に於ける日本取引所》（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1928），頁111、114-115。
- 37 哈爾濱市工商聯合會，《哈爾濱製粉業史料》，頁34--35。
- 38 橫濱正金銀行頭取席調查課，《『大連メモ』集》（東京：橫濱正金銀行頭取席調查課，昭和九年），頁125-129。
- 39 關於上海製粉業的企業結構發展，參見 Kai Yiu Chan, "Market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Structure in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ice and Flour Trade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900-1936"；又見 Kai Yiu Ch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ain Market in Modern Shangha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ice and Flour Trade, 1900-1936"。
- 40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ost First World War Depression for the China Treaty-port Economy, 1921-23", in Ian Brown, ed., *The Economies of Africa and Asia in the Inter-War Depression*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221-252.
- 41 關於「滿洲製粉」等日資在華投資活動，其中最大是在滿洲地區，見陳計堯，〈日本製粉業の對中國投資〉，（楊素霞譯），富澤芳亞、久保亨、萩原充（編），《近代中國を生きる日系企業》（大阪：大阪大學出版會，2011），頁245-262。
- 42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明治四十三年），頁5、11。
- 43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續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頁5-6、9、28、66-67、70-71、95-

- 96、139。
- 44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頁48-49、106、123、148、附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壹》,頁22、76、91、110;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二》,頁165;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三》,頁14-15、64;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四》,頁17-18、61、121;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五》,頁62。
- 45 外務省,《北滿洲之産業》(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明治四十一年),頁96、108-109、111-116、151-152、155、254-255。
- 46 外務省,《北滿洲之産業》,頁96;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續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頁28、70-71;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頁22、218;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壹》,頁195、225、233;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二》,頁30-31、105-106、163;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三》,頁31;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四》,頁7、13、94、119;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五》,頁123、127-128;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六》(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明治四十三年),頁70-71、83。
- 47 Sidney D. Gamble, *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 A Study of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283 Chinese Families Receiving from \$8 to \$550 Silver per Month*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Co., 1933), pp.76-89.
- 48 見關東都督府民政部庶務課(編),《滿洲穀物取引慣習一斑(明治43年9月)》(東京:龍溪書舍,1999年復刻1910年版),頁35-43;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頁66-69;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頁75-78、108-109、133;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壹》,頁16;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三》,頁85、109-110、129、145-146;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四》,頁33-34、41、119、127-128、155;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五》,頁5-6、35-36、62-63、92-94;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六》,頁70-71。
- 49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四》,頁20-23。關於朝鮮米的品種屬於粳米,見岡田重吉,《朝鮮米輸出事情》(東京:同文館,明治四十四年),頁13-14。
- 50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南滿洲米作概況(大正二年)》(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正二年),頁1;岡川榮藏,《滿洲米作論》(東京:大阪屋號書店,大正十二年),頁14-16。到1930年代初也有一種說法是有一名華人召募兩名朝鮮人開墾水田,見東亞經濟調查局(編),《本邦に於ける米の需給——附滿洲に於ける米》(東京:東亞經濟調查局,昭和七年),頁89。

- 51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南滿洲米作概況（大正二年）》，頁1-2。關於鐵道「附屬地」的問題，見程維榮，《近代東北鐵路附屬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尤其是關於農業的部份，頁196-204。
- 52 農商務省，《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東京：農商務省，1917），頁27。關於面積換算，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調查課（編），《支那農民の北滿植民と其前途》（大阪：大阪毎日新聞社，昭和六年），「度量衡比較表」。朝鮮人移民所導致的水田開發的部份，另見金穎，《中國東北地區水利開發史研究（1840-194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195-202。
- 53 農商務省，《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頁27-28。
- 54 橫山四郎（編），《營口產米事情》（營口：營口商工公會，康德六年），頁7-8。
- 55 農商務省，《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頁28。
- 56 農商務省，《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頁32。
- 57 一戶正侯，《内外臺鮮定期米穀取引事情及統計》（東京：一戶正侯，大正九年），頁264-265。
- 58 Kai Yiu Chan, “The Rice and Wheat Flour Market Economies in the Lower Yangzi, 1900-1936”, p.80.
- 59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商品としての滿洲米》（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昭和二年），頁15；郭鐵樑、關捷（主編），《日本殖民統治大連四十年史》（上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上冊，頁230-231。
- 60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商品としての滿洲米》，頁15。
- 61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商品としての滿洲米》，頁15。
- 62 農商務省，《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頁34。關於其他省份的習慣，見東亞同文會，《支那經濟全書》（東京：東亞同文會編纂局，1908），第十一輯，頁267-268。
- 63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商品としての滿洲米》，頁16-17。
- 64 岡川榮藏，《滿洲米作論》，頁87-88。
- 65 王廣義，《近代中國東北鄉村社會研究（1840-1931）》（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頁173；農商務省，《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頁30-31。
- 66 王廣義，《近代中國東北鄉村社會研究（1840-1931）》，頁173；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北滿洲支那農民經濟》（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昭和四年），頁467。
- 67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北滿洲支那農民經濟》，頁452-453；關東州普蘭店民政署，《管內支那人の農家經濟》（大連：關東州普蘭店民政署，昭和七年），頁190-191。
- 68 民政部總務司調查科（編），《在滿朝鮮人事情》（新京：民政部總務司調查科，大同二年），頁127-128；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地方課，《滿蒙農政私案》（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地方課，大正七年），頁97-105。
- 69 關於華人移民的部份，見滿蒙產業研究會（編纂），《滿洲產業界より見たる支那の苦力》（大連：滿洲經濟時報社，大正九年）；篠崎嘉郎，《滿洲金融及財界の現狀・下卷》（大連：大阪屋號書店，昭和三年），頁97-107；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民國十六年の滿洲出稼者》（大連：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昭和二年), 頁132-142; 范立君, 《近代關內移民與中國東北社會變遷(1860-1931)》(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頁105-113; 馬平安, 《近代東北移民研究》(濟南: 齊魯書社, 2009), 頁42-61。關於朝鮮人移民的部份, 見篠崎嘉郎, 《滿洲金融及財界の現状・下卷》, 頁120-127; 民政部總務司調查科(編), 《在滿朝鮮人事情》, 頁4-5; 金穎, 《中國東北地區水利開發史研究(1840-1945)》, 頁198; 馬平安, 《近代東北移民研究》, 頁105-118。關於日本移民, 見篠崎嘉郎, 《滿洲金融及財界の現状・下卷》, 頁108-120; 馬平安, 《近代東北移民研究》, 頁80-85。
- 70 東亞經濟調查局(編), 《本邦に於ける米の需給——附 滿洲に於ける米》, 頁103。
- 71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 《商品としての滿洲米》, 頁40。
- 72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 《商品としての滿洲米》, 頁41-42。
- 73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 《商品としての滿洲米》, 頁42-49。
- 74 關於滿洲地區外來米輸入, 參見農商務省, 《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 頁41-42。
- 75 滿鐵產業部, 《關東州中心對北支戎克貿易現狀》(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昭和十二年), 頁320之次三。
- 76 岡田重吉, 《朝鮮輸出米事情》(東京: 同文館, 明治四十四年), 頁39-42、53-54、62-66。
- 77 農商務省, 《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 頁35-36。
- 78 岡田重吉, 《朝鮮輸出米事情》, 頁91-92。
- 79 岡田重吉, 《朝鮮輸出米事情》, 頁92; 農商務省, 《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 頁39。
- 80 農商務省, 《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 頁39-40。
- 81 農商務省, 《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 頁39-40。
- 82 東畑精一、大川一司, 《朝鮮米穀經濟論》(東京: 日本學術振興會, 昭和十年), 頁120-122; 樋口節夫, 《近代朝鮮のライスマーケット》(京都: 海青社, 1988), 頁132-137。
- 83 1920年代後期, 朝鮮米在滿洲市場的問題, 見朝鮮殖產銀行調查課, 《朝鮮ノ米》(京城: 朝鮮殖產銀行調查課, 昭和三年), 頁94; 朝鮮總都府殖產局, 《朝鮮の米》(京城: 朝鮮總都府殖產局, 昭和四年), 頁54。
- 84 農商務省, 《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 頁41。
- 85 關於香港在東亞經貿地位, 見濱下武志, 《香港——アジアのネットワーク都市》(東京: 筑摩書房, 1996);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2<sup>nd</sup> edit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G. B. Endacott, *An Eastern Entrepô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4); 張曉輝, 《香港近代經濟史(1840-1949)》(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1), 頁93-198; 關於它在米穀貿易上的角色, 見 David Faure, "The Rice Trade in Hong Kong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lizabeth Sinn 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pp.216-225; 鄭宏泰、黃紹倫, 《香港米業史》(香港: 三聯書店, 2005); James C.



- Ingram, "Thailand's Rice Trad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C.D. Cowan, 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4), pp.102-126。
- 86 農商務省,《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頁41。
- 87 陳計堯,〈廣東糧食貿易及其經營(1900-1937):米穀與麥粉〉,陳明鈺、饒美蛟(主編),《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係1900-1938》(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頁221-238。
- 88 古口賢治,《南洋の米》(東京:新嘉坡商品陳列館,1921),頁49、107、165、181-182;農商務省,《支那ノ米ニ關スル調査》,頁272。
- 89 請參見東京高等商業學校,《香港通過商業調查報告書(明治四十年)》(東京:東京高等商業學校,1909),頁28-33;農商務省商務局,《南部支那及香港ニ於ケル商工業[其一]》(東京:農商務省商務局,1912),頁35-50;外務省通商局,《香港事情》(東京:外務省通商局,1917),頁180-188;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誌:第一卷[滿洲附香港澳門]》(東京:東亞同文會,1917),頁998-1012;前田寶治郎,《香港概觀》(東京:前田寶治郎,1919),頁289-307。
- 90 泉三義,〈滿洲機械製粉業の經濟機構〉,東亞商科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編),《東亞經濟研究年報》第一輯(東京:日本評論社,昭和十七年),頁465-521;泉三義,《日本製粉業論》(東京:泉三義,2004),頁101-110。

A Study of the Rice (and Paddy) and Wheat Flour Trad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Business Organization in Modern Manchuria  
(1864-c.a.1930)

Kai Yiu Chan \*

**Abstract**

Manchuria (or the so-called ‘Three Northern Province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witnesse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accompanied with the opening to external trade in the 1860s not only brought about further advancement to the already flourished bean trade but also created other novel changes. Massive demographic influx from the neighbouring provinces of Hebei and Shandong, together with the numerous migrants of foreign nationalities (particularly the Russians, Koreans, and Japanese), all formed a multicultural, multi-layered colonial society. These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of development to the Manchurian economy which had hitherto over-dependent upon the bean trade. They also practically created new demands for food grains other than the beans, possibly causing considerable impact upon the organization of grain trade. This article uses wheat flour and rice (and paddy)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se two commodities from 1864 to around 1930,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 in the Manchurian new food grains un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at trade.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trade transformation of rice (and paddy) and wheat flour in the commodity market of modern Manchuri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re was phenomenal growth in the trade volume throughout most of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all began to decline since the early 1920s. Besides, trade was import-oriented. Even though Manchuria was gifted in wheat trade, it still encountered decline in the 1920s. Imported flour and rice interacted with their respective trade organization in two different ways. Two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 can be found in Manchurian rice and flour. Firstly, the flour trade depended upon the market mechanism

---

\* Correspondence to: Kai Yiu Ch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Road, Tainan City, Taiwan 701  
E-mail: kaiychan@mail.ncku.edu.tw

from material purchasing to product distribution, going through market agents for transactions, lead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whole business system could b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That further disadvantaged Manchurian flour to compete with those imported from Shanghai. It was because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a proces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took place among some of the flour mills. Secondly, in the rice and paddy trade (including Manchurian and Korean rice) of Manchuria, there was no obvious 'associate comp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ce mills and the rice merchants. Japanese trading firms also conducted a multi-product business, not specializing on the rice and paddy trade. However, partly because of the eating habits of some Manchurian migrants, rice mills achieved some degree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which was an obvious divergenc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lower Yangzi and the Guangdong regions.

**Keywords**

Manchuria, rice (and paddy), wheat flour, flour mill, rice mill

